



水畔争鸣

[第六辑]

中国水浒学会
湖北大学人文学院

主办

● 张国光 余大平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

中国水浒学会、湖北大学人文学院主办

《水 浒》争 鸣

第六辑

张国光 余大平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水浒争鸣/张国光, 余大平主编.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1. 2

ISBN 7-80145-369-7

I. 水… II. ①张…②余… III. 《水浒》研究—文集
IV. I207.4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2539 号

水浒争鸣 第六辑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永安路 106 号)

邮政编码: 100050

电话: 63082642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13 印张 字数 300 千字

2001 年 2 月第 1 版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册 ISBN 7-80145-369-7G·201

定价: 24 元

《水浒争鸣》编委名单

- 名誉顾问：陈 沂 李尔重 韩喜凯
- 顾 问：邓绍基 徐 放 廖仲安 聂石樵 吴小如
李希凡 朱一玄 徐中玉 章培恒 刘 冬
- 主 编：张国光 余大平
- 副 主 编：周 峰 王仁铭
- 编 委：刘世德 邓庆佑 蔡 毅 李永祜 蔡钟翔
陈熙中 竺 青 郭英德 徐华西
(以上北京)
- 鲁德才 罗德荣 (以上天津)
- 王汝梅(吉林) 伊永文(黑龙江) 林 辰(辽宁)
宋谋瑒(山西) 杜贵晨(河北) 曲 沐(贵州)
郭豫适 谭 帆 周锡山(以上上海)
- 袁世硕 王 平 赵 萍 许继善 朱希江
孙景全 张稔让 朱其铠 周 晶 王振星
(以上山东)
- 陈 辽 李灵年 皋古华 刘兆清 张袁祥
王永健 黄叔成 (以上江苏)
- 蔡景康 齐裕焜 蒋松源 (以上福建)
- 马成生 杨子华(以上浙江)
- 严云受 周中明 石钟扬 (以上安徽)
- 胡世厚 王 基 张红运 (以上河南)
- 宋克夫 盛瑞裕 陈文新 谭邦和 张 皓

古远清	石 麟	徐又良	单长江	卫衍翔		
张 虹	傅隆基	胡忆肖	(以上湖北)			
马积高	陈松柏	(以上湖南)				
王志武	田 荣	雷 勇	(以上陕西)			
曾扬华	杨芷华	刘烈茂	(以上广东)			
张文勋	郭兴良	(以上云南)				
胥惠民	王佑夫	(以上新疆)				

目 录

《水浒争鸣》续刊词

——兼论我国的《水浒》学与“红学”

研究,应彼此取长补短、相互促进

的问题……………张国光、余大平/1

《宣和遗事》与宋元水浒故事……………余大平/6

《水浒传》与山东梁山泊……………汤国梁/15

施耐庵研究的演进过程……………张袁祥/23

《水浒传》与张士诚起义

——《水浒》杂考之一……………臧古华、曹晋杰/38

《水浒传》作者考辨八说……………陈松柏/47

《水浒传》专制政体模式之解读……………胡淳艳/60

“替天行道”行何“道”

——关于《水浒》中“道”的辨析……………陈 辽/66

略论《水浒传》的复仇主题……………张 皓/72

关于苏东坡与高俅

——无意于考据的考据……………杨建文/78

论《水浒传》中宋江形象的塑造……………欧阳代发/83

吸收·分解·延伸·传奇化

——从元杂剧水浒戏看《水浒传》中

李逵形象的塑造……………曾凡安/92

一个特异的儒家精神世界

——水浒群雄的内质解析……………刘玉玲/101

为倡明我国《水浒》学新流派
并翻金圣叹评改《水浒》之案而论争

——简评张国光教授的“水浒学”

研究成果……………望青李定广/356

增删不当,失神变形

——评电视连续剧《水浒传》塑造人物

形象上的失误及其经验教训……………李永祜/365

《水浒》邮票背后的故事……………曹流姜海/379

我国著名的《水浒》邮票画家

周峰先生简介……………清荣/382

施耐庵墓……………浦玉生/384

施耐庵陵园……………施金根/388

为方腊起义遗迹“帮源洞”

洞址辨位的说明……………方才洪长寿余锦根/390

椽笔丹青擷民魂

——记水浒人物画家孙景全……………王广民/392

咏《水浒》诗词选刊

李建章、胡国瑞、吴丈蜀、霍松林、张国光

宋谋瑒、陈流沙、刘中光、刘操南……………/396

〔附录〕

中国水浒学会致“93 中国古代小说国际研讨会”的

贺信……………/403

《水浒争鸣》第一届优秀论文评奖获奖论文暨作者

名录……………/406

《水浒争鸣》续刊词

——兼论我国的《水浒》学与“红学”研究
应彼此取长补短、相互促进的问题

张国光 余大平

《水浒争鸣》是我国《水浒》学界创办的、以系统地开展对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的研究，并弘扬优秀的“水浒文化”为主旨的专业性学刊。1982年由当时新成立的我国第一家研究古典文学名著《水浒》的省级学会——湖北省水浒研究会主办。推张国光教授任主编，黄清泉、吴志达、傅隆基、李悔吾、黄瑞云、余大平教授为副主编。还聘请了全国一些著名的老专家担任顾问，用稿不分畛域。本辑刊第一辑，由长江文艺出版社于同年出版，第二辑出版于1983年，第三辑出版于1984年，第四辑出版于1985年，第五辑则于1986年改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此外，本辑刊编委会还与《武汉师范学院（湖北大学前身）学报》联合出版了一本《“施耐庵文物”研究特辑》，又由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出版了1984年在武汉举行的首届中国古代小说理论讨论会论文特辑：《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以上诸本专辑的面世，使得我国《水浒》研究的阵容，为之焕然一新；也推动了“中国水文学”的理论建设。自此“五四”以来长期被误解、贬斥的古代的长篇小说评点派也得以恢复名誉。特别是我们最先为我国大文学批评家、思想家金圣叹翻案所作的艰苦努力，尤为全

2 《水浒》争鸣

国所称道。这也是中国水浒学会终于能在1987年于湖北襄樊市举行的第四次全国《水浒》讨论会上宣告成立的主因。可以说：从80年代以来，《水浒争鸣》已成为有一定知名度的学术辑刊。因此当1998年由于43集《水浒》电视剧的上映，在全国掀起评议《水浒》的新热潮时，有的出版社还曾大量选录《水浒争鸣》中所发表的文章，私自重印出版。这都说明：它在我国《水浒》研究史上的参考价值，是不容否认的。而《文艺报》在80年代末刊出的报道中，也曾盛称：改革开放以来由《水浒》研究界努力倡明的“金圣叹学”，在全国已呈“走红”之势，云云。

正当我会的学术研究活动阔步前进之时，本来就给我们的《水浒》学研究的命运休戚相关的我国红学界，也出现了要求打破各自的研究壁垒，开展《水浒》学与红学的学术交流，以利于互相取长补短、并肩前进的迫切愿望。而我国《水浒》研究界同仁也认识到：正如要开辟《水浒》研究的新天地，首先需要致力于为大文学家金圣叹翻案一样；而要革新70年来红学研究的面貌，也必须从为120回的《红楼梦》暨其续改者高鹗“平反”入手。这也就是说必须确认高鹗是曹雪芹的真正知音，而绝不是什么“特务文人”。为此，我们又在《水浒》双两说（即《两种〈水浒〉》，两个宋江——金圣叹评改〈水浒〉有大功说》）的基础上，提出了红学“双两说”（即《两种〈红楼梦〉》，两个薛宝钗——高鹗续改〈红楼梦〉有大功说》），并由此派生出：俞平伯先生是研究脂砚斋评本《石头记》的；他提出的“自传说”、“钗黛合一说”、“色空说”都是从脂本中总结出的认识，也都是不错的。而50年代出来带头“批俞”的“两个小人物”读的则是已刊行了一百五十年的程伟元、高鹗续补写定了的120回的《红楼梦》而已。他们反对胡适、俞平伯的一系列观点，特别是反对“钗黛合一”说，并把钗、黛对立起来，视之为不容并存的“情敌”诸说，都是没有说服力的。据此我们就大胆提出了1954年的“批俞”运动，

乃是无的放矢,只能看作是“一场历史的误会”之说。但这一冤、假、错案自1954年起到1988年止,共历时35年之久,在此期间,俞先生一直被当作“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孤立起来。甚至到80年代末,竟然还有“红学家”继续对此一大学术公案说三道四;认为俞平伯真的错了,当时批得有理,云云。幸而到了1988年,新成立武汉红楼梦学会,立即挺身而出,开展了为高鹗平反并为俞平伯先生正名的论争。以后我们又为反对红学领域的浮夸风、作伪风和抄袭风,进行多种形式的、引起了红学界广泛注目的笔战,我们前后共举办过8次红学研讨会,出版过《红学新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和《红学新澜》七期,还重新整理出版了百二十回的程乙本《红楼梦》。这样才能使得素来对红学贡献较少的武汉地区的古典文学界,一跃而跨进了全国研究红学的先进的行列。1993年,本会为了纪念毛泽东同志百周年诞辰,复联合中国红楼梦学会在庐山举行了毛泽东论《水浒》、《红楼梦》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被专家们评为是一次“规模大,规格高,所讨论的问题具有深远意义,对《水浒》、《红楼梦》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研究,具有推进作用”(《文化遗产》,1993年6期)的学术盛会。

显然,在我会同入一度把注意力转移到红学领域之时,对于《水浒》的研究活动和出版工作,自然就会有所削弱。《水浒争鸣》的中断出版,就是一件十分令人遗憾的事!幸而在此世纪之交,《水浒》研究的前景仍是非常广阔的,继续出版《水浒争鸣》辑刊的工作也得到了湖北大学和湖北大学人文学院负责同志的支持,《光明日报》出版社的热情关注,这才能使为人们渴望已久的第六辑《水浒争鸣》能够以更更新的姿态呈现于世。还要特别感谢《光明日报》出版社的徐华西总编的严格审稿和田苗主任精益求精不厌其烦地修改稿件,从而使本辑刊的质量有了保证。我们今后将进一步与有关高校和各地《水浒》研究团体开展协作,并力争把本辑刊

4 《水浒》争鸣

办成具有广泛而持久影响的,能使国内外有志于为建设“水浒学”和“金圣叹学”作贡献的专家以及《水浒》的广大读者,都以先睹为快的学术性辑刊,直至使它成为定期出版发行的学术杂志。至于本辑刊的宗旨和用稿原则,在20年前出版的《水浒争鸣》第一辑,我们已经宣告过了。兹摘引如下:

当时我们盛称:“《水浒》是中华民族丰富多彩、源远流长的文学史上异军突起、卓立千古的不朽之作”。“它是中国唯一的,也是世界上不多见的,以描写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为中心内容的史诗式的古典现实主义伟著。”由于它给古今读者讲说了一批英雄人物的传奇故事,并勇敢地为来自社会底层的人物树碑立传,让他们占据着文艺舞台的中心。因此,“《水浒》这部名著就不仅是现实主义的杰作,而且也是浪漫主义的高峰。”

我们又强调:

《水浒》在我国白话文学发展史上,还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是我国已有数百年历史的白话文进入成熟阶段的巨大标志。有了《水浒》,我国才有了第一部成功的长篇白话小说,而《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遂继之而起。到“五四”提倡白话文时期,也举《水浒》、《红楼梦》的语言为范例,可见这部小说有深远影响于我国的新文学运动。

至于《水浒》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我们认为也是不可动摇的。鲁迅就曾称道:赛珍珠女士30年代英译的七十回本《水浒》,“闻颇好!”欧美评论家也有称《水浒》作者可比荷马和列夫·托尔斯泰的。在日本以及东南亚,研究《水浒》的学者就不少。《水浒》的日文、俄文、法文译本都在国外得到过高度的评价,可见它早已跻身于世界文学名著之林,这是我国的骄傲!

在该《卷头语》中我们还论述了在我国成立专门研究《水浒》的

学术社团的必要性:这是因为,由于种种原因,对于这样一部中外名著,我国的研究工作还不能适应客观的需要。迄今,无论是对《水浒》版本的源流和原作者生平的考证,或对小说的主题思想、情节结构和人物形象的论析,以及对它的评点、删改者李卓吾、金圣叹等人的功过的评价,历来的研究者看法都是有分歧的,甚至出现了尖锐对立的现象。至于“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搞起的“评《水浒》”运动在理论上造成的混乱,尤有待于继续予以澄清。这就要求我国的《水浒》研究工作者加强联系,互相切磋,交流心得,开展争鸣,促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水浒》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

我们还阐明了出刊《水浒争鸣》的目的是为了通过《水浒》研究成果的交流,总结我国学术界研究《水浒》的历史经验及其教训,并重点讨论涉及《水浒》领域的在当前分歧较大、争论得很热烈的一些问题。我们将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双百方针,提倡勇于探索、大胆创新而又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学风;欢迎说理透彻、观点鲜明、见解新颖而又要言不烦的文章和有参考价值的译稿。我们诚恳地希望研究《水浒》的老专家、发表过有影响的《水浒》论著的研究工作者和后起之秀,多和我们联系并惠赐鸿文,以利于共同把这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工作搞好!

以上《卷头语》虽写于20年前,但我们认为它至今还有其现实意义,特把它重新摘录于此,祈本学会理事会和本刊编委会同人暨海内外的读者和作者明鉴!

《宣和遗事》与宋元水浒故事

余大平

中国小说史中关于宋元话本的许多问题，学术界已经作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尤其是鲁迅先生，他对这一研究的开拓之功一直为后世学人所钦佩。在一些有关宋元话本的文献资料中，可以见到广泛流传于宋元时期的水浒故事的情况。《宣和遗事》（以下简称《遗事》）中《梁山泊聚义本末》（以下简称《本末》）一段文字，是学术界公认的目前研究宋元水浒故事流传情况的最具体、最详细的资料。

关于《遗事》，有人说它是话本，有人说它是笔记，还有人说它是杂抄各书而体例杂乱的书。其“前集”虽然不乏史实方面的文字，但“说话”的风格颇为突出，其资料来源似乎主要是话本；其“后集”虽然间有一些“说话”的意味，但以史笔为主，其资料来源可能主要是笔记、野史之类。而对于其中《本末》那一段文字来说，学术界一般都认为它是抄自有关水浒故事的话本的（准确地说是缩写）。

《遗事》的主要思想内容是总结北宋亡国的惨痛的历史教训。“前集”重在写因，“后集”重在写果，前后两集的因果结构关系十分明显。

“前集”在叙述徽宗即位时，一口气接连点了蔡京、童贯、杨戩、高俅、朱勔、王黼、梁师成、李彦等奸臣的姓名，接着又点了章惇、蔡卞和蔡攸，真使人有国家不幸，奸臣何其多的感叹。他们当中，蔡

京“乱纲纪”，“专恣任意”，“选置将吏，皆取中旨，不复关朝廷”；朱勔“创花石纲”；他们勾结起来，像苍蝇一样地围聚在徽宗的周围，“权倾朝野”。他们惟一要做的事情，便是“附会徽宗，恣行骄淫”：他们怂恿徽宗私行宫外，嫖妓宿娼；以给徽宗祝寿为名，“命府、州、县、道，遍立寺观”；窜掇徽宗广建宫室，筑万寿山，“运四方花竹奇石，积累二十余年，山林高深，千岩万壑，麋鹿成群，楼观台殿，不可胜记”。他们肆意掠夺民脂民膏，耗费了国家的无数钱财。

他们的倒行逆施，激起了老百姓的愤怒和仇恨。《遗事》记录了两则民谣。一则是：“二蔡一淳，必定沙门；籍没家财，禁锢子孙。”另一则是：“大淳小淳，入地无门；大蔡小蔡，还他命债。”另据《宋稗类抄》卷二也有一则当时的民谣：“打破筒（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由此可见人民群众对他们是恨之入骨的。

“前集”对宋徽宗的昏庸与荒淫无道也不放过，认为国家的兴衰“都关系着皇帝一人心术之邪正”，一开始便历数从商纣王、周幽王直至唐明皇等一系列昏君的过失，直接把话头引到了徽宗的身上：

今日说话的，也说一个无道的君王，信用小人，荒淫无度，把那祖宗浑沌的世界坏了，父子将身投北去也，全不思量祖宗创造基业时，直是不容易也！

对徽宗荒淫生活的描写，除花石纲和宠信道士之外，还集中于私幸李师师一事。徽宗被童贯等一帮奸臣包围，置国事朝政于不顾，终日淫乐。先是偷偷摸摸地嫖妓宿娼，后来竟公开地将李师师接进宫中，敕封为明妃。其荒淫无耻的程度，在封建帝王中也算是一个典型了。

在“后集”里，由于北宋亡国，皇帝被俘，国家遭到了空前的惨祸和奇耻大辱，“前集”中那种对昏君奸臣深刻揭露的主题迅速转

变为对国家与民族的哀痛与对敌人仇恨的描写。宋徽宗也由揭露和批判的对象而变为受到国人同情的对象,由荒淫昏庸的象征,一变而为遭受压迫与欺凌的国家与民族的象征。这一转变显得突然而又自然。“前集”和“后集”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与气氛的不协调,但这又是合情合理的。

“后集”写得最多的是对敌人野蛮暴行的控诉和亡国、亡家之后沉重的悲愤。靖康之变,汴京陷落,金人“遣使人城,求两式幸虏营面议和及割地事”;然后“遣入城搬挈书籍,并国子监、三省、六部司或官制天下户口图,人民财物”;“又遣人搬运法物、车辂、卤簿、太常乐器及钟鼓刻漏,应是朝廷仪制,取之无有少遗”。一派亡国的景象。

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徽宗和钦宗,在国家遭到剧烈惨祸的时候,他们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他们也受到了敌人的欺侮。下面一段文字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老百姓对待亡国之君的态度:

车驾(钦宗)出幸金兵营,百姓数万人扼车驾,曰:“陛下不可轻出。若出,事在不测!”号泣不与行,帝亦泣下。

徽宗与钦宗后来惨死在异国他乡。这两个皇帝的悲惨遭遇,概括了一个国家与民族的灾难和耻辱,在这个国家与民族的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中留下了淌着鲜血的创伤,必定会激发起人民群众高昂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思想。老百姓对赵宋皇帝由仇视而转变为同情便是证明。

“前集”和“后集”在叙事方面虽然各有侧重,但其中心思想是统一的,即通过北宋灭亡的惨痛的历史教训,说明皇帝昏庸、权奸当道是造成亡国之祸的根本原因。由于皇帝也遭到了奇耻大辱,受到国人的同情,因而《遗事》批判与谴责的锋芒主要是瞄准权奸人物的。

《遗事》这种以反权奸为主要思想倾向的特点,对“前集”中那一段提纲式的水浒故事——《本末》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第一,《遗事》为《本末》布置了一个“官逼民反”的社会环境。这主要是关于“花石纲”问题的叙述。花石纲是宋徽宗为了满足自己享乐腐化生活的需要而搞起来的。朱勔、蔡京等人为了讨好徽宗,任意扩大花石纲的规模,残酷地役使老百姓,野蛮地掠夺民间财物,人民群众家破人亡,怨声载道:

凡士庶之家,有一花一木之妙的,悉以黄帕遮覆,指做御前之物。不问坟墓之(间),尽皆发掘。石巨者高广数丈,将巨舰装载,用千夫牵挽;凿河断桥,毁堰拆闸,数月方至京师。一花费数千贯,一石费数万缗。

《遗事》对花石纲的揭露,都坐实在人民群众所遭受的折磨和苦难上。所以,《本末》便直接从花石纲开始叙说梁山好汉造反起义的故事。

以杨志为首的十二个造反的朝廷军官,他们虽然不是苦役民工,但是他们也受到花石纲之害,不得已才奋起抗争。由此可知一般小民百姓的反抗怒火是多么炽烈了。以宋江为首的三十六人中,大部分人都有这种被逼造反的经历。“逼上梁山”的说法,在这里就已经产生了。《遗事》把花石纲(紧接着又有“生辰纲”)的罪过,主要归之于朱勔等权奸人物的身上,对宋徽宗多有回护或批评甚少,这就为杨志等十二人添上了一抹虽然造反,但不反皇帝的政治色彩,于故事的开头便定下了忠义思想的调子。

《遗事》的“后集”在开始部分收载“陈东伏阙上书”一事。陈东“数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勔之罪,指为六贼”,愤怒地揭露花石纲对人民的祸害和朱勔等人的罪恶。“陈东上书”的加入,使得《遗事》的“官逼民反”的思想倾向更加明朗化了。陈东的

政治见解,当然要受到传统的儒家思想的制约。但是在这权奸为患的生死攸关的时候,儒家的思想也好,细民百姓的思想也好,都自动汇聚到拯救国家、振兴民族的道路上来了。对于封建士大夫的代表人物陈东来说,面对黑暗的政治、破碎的河山,他也不得不痛苦地承认了“官逼民反”的现实。这实际上就是承认了“梁山泊聚义”的合理性。当然,所谓“合理性”,只能是以忠义思想的尺度来衡量的。

第二,《遗事》还为《本末》准备了更全面的、依托于整个时代的大型历史背景。这就是在内忧外患造成了国破家亡的形势下,国家与民族的命运要求忠臣义士挺身而出,铲除奸佞,抵御外侮。这是整个时代对于忠义思想的召唤。《遗事》用了很多的笔墨详载权奸人物受到朝野惩罚的情况,读来使人觉得痛快。例如:

钦宗诏窜王黼永州,籍其家,得金宝以万计……遣使武吏杀之,取其首级以献。朱勔削官放归田里,……寻亦赐死,……籍其家。……遂窜蔡京儋州编置,及其子孙三十三人……怨恨而死……蔡攸责永州安置……后移万安军,朝廷遣使就万安军斩之,传首四方……朝廷下诏数童贯误国家之罪有十,追至南雄州斩之,传首京师。

钦宗下诏处死奸臣,是在朝野人士的强大压力下进行的,这正应了“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的古训,可见当时全国老百姓和正直的士大夫对这帮奸臣痛恨的程度,全国上下反权奸的呼声多么高涨。然而,仅仅杀掉几个奸臣还是不能拯救国家与民族的危亡的。因为像“六贼”这样祸国殃民的奸臣还有许多(不久又有汪伯彦、黄潜善之流,再往后还有秦桧之流),反权奸始终是北宋和南宋全社会的呼声。当时北宋王朝的国力十分疲弱,一些爱国志士空有救国之志而没有杀敌救国的力量,而且受到卖国奸臣的掣肘和